

媒介負面內容與社會距離對 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

羅文輝^{**}

《摘要》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媒介負面內容、社會距離與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間的關係。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有線電視色情節目、電視暴力影片及電視靈異節目，受訪者均認為這三類媒介內容對別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此外，本研究也發現，媒介的負面內容和社會距離會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媒介負面內容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愈大，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

當然，本研究比較重要的發現，是證明「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並非預測限制媒介的可靠變項。過去的研究採用「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來預測支持限制媒介，並未考慮此一變項無法區分兩類受訪者：第一類是認為媒介對自己及他人都有很大影響的受訪者，另一類是認為媒介對自己及他人都沒有太大影響的受訪者。這樣的發現不僅指出過去研究的缺失，也指出未來的研究值得探討的方向。

關鍵詞：第三人效果、支持限制媒介、電視暴力、色情

投稿日期：89年4月20日；通過日期：89年9月10日。

^{*} 本文榮獲中華傳播學會第四屆年會傑出論文獎。本文作者感謝政大新聞系博士班學生蔣傳寅、劉平君擔任研究助理，幫助蒐集資料，執行問卷調查，碩士班學生王浩然幫忙整理稿件。作者並感謝國科會提供研究經費（NSC 88-2412-H-004-012）。

^{**}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E-mail: loven@nccu.edu.tw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媒介的負面內容與社會距離是否會影響第三人效果，並分析第三人效果和支持限制媒介間的關係。

過去的第三人效果研究，有不少嘗試探討那些因素會影響媒介「對自己影響的認知」(perceived effect on self)與媒介「對別人影響的認知」(perceived effect on others)間的差距(又稱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Perloff, 1999)。其中部分研究發現，「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會受到媒介內容的影響。如果媒介內容是負面的或不需要的(如暴力、色情、負面廣告等)，受訪者會認為該媒介內容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對別人的影響較大。如果媒介內容是正面的或需要的(如公共宣導、新聞報導等)，受訪者會認為該媒介內容對自己的影響較大，對別人的影響較小；或是認為該媒介內容對自己和別人的影響差別不大。

雖然過去的研究發現，媒介的負面內容比正面的內容會造成較大的「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但過去的研究從未探討不同的媒介負面內容是否會造成不同的「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本研究認為媒介內容的不需要性(undesirability)或負面程度會影響「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媒介內容的不需要性愈高，或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愈大，受訪者會愈傾向認為該媒介內容對別人的影響大於對自己的影響(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較大)。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討媒介內容的負面程度與「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間的關係。

此外，本研究也試圖探討「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與第三人效果的關係。過去的研究發現，受訪者認為媒介內容會對比較像自己或比較接近自己的人(社會距離較近者)影響較小，對比較不像自己或和自己距離較遠的人影響較大。但過去的相關研究發現有相當的差異，本研究認為過去研究發生歧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過去的相關研究主要以成年人(大學生)為受試對象，請受試大學生比較媒介內容對自己、其他同校大學生、其他一般民眾或其他年輕人的影響，過去的研究均未考慮年齡和教育程度，可能會影響社會距離和第三人效果間的關係，因而造成研究發現的歧異。因此，本研究的另一個目的，是針對成年人和青少年進行比較分析，希望在控制年齡和教育程度的情形下，探討社會距離和第三人效果間的關係。

最後，本研究將嘗試探討「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與支持限制媒介的關係。過去的研究指出，「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是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顯著

變項，本研究將嘗試證明「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並非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可靠變項。

本文將首先介紹第三人效果的相關文獻，其次分析媒介的負面內容、社會距離與第三人效果間的關係，並嘗試說明為什麼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無法可靠地預測支持限制媒介，隨後將提出研究假設，描述研究方法，並進行資料分析。

貳、相關文獻

一、第三人效果

最早提出第三人效果的學者是Davison（1983）。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發現在太平洋一個小島上的美軍部隊，係由白人軍官和黑人士兵組成，於是日本便對該小島上的美軍部隊用空投方式散發傳單，傳單內容強調：「這是白人的戰爭，日本人和有色民族並無紛爭……」，該傳單並要求黑人：「不要為白人犧牲，要找機會投降或逃亡。」（Davison, 1983, p.1）在日本空投傳單第二天，該小島上的美軍就撤退了。後來發現，傳單對黑人士兵並沒有影響，但卻使白人軍官擔心黑人士兵逃亡，因此造成美軍撤退。

為了證明第三人效果，Davison（1983）還舉出其他研究證據。例如，在1977年，當「根」（Roots）這部電視影集在美國播出後，有好幾項研究曾分析這部影集對美國民眾的影響。這些研究發現，大多數受訪者預測這部影集對美國白人和黑人的態度有相當大的影響，受訪者認為白人的容忍度和同情心會增加，黑人則會感到憤怒、痛苦和仇視。然而研究人員問受訪者這部影片對他們自己的影響時，絕大多數受訪的白人與黑人都指出，看過「根」這部影集後，最大的影響是使他們產生一些感傷，但對他們的態度沒有影響（Hur & Robinson, 1978; Surlin, 1978）。

這些現象與證據，促使Davison提出第三人效果假設。這個假設預測：「人們會傾向高估大眾傳播對他人態度與行為的影響。更明確地說，暴露在說服訊息下的閱聽人會期望該說服訊息對其他人的影響，比對自己的影響大。而閱聽人對說服訊息對他人的預期影響力，可能促使他們採取某些行動。」（Davison, 1983, p.3）換言之，該說服訊息的效果，可能不是因為閱聽人真正受到影響，而是由於閱聽人期望或認為其他人可能會受到影響，因而產生效果（Davison, 1983）。

Davison把這種現象稱為第三人效果，為了驗證第三人效果，他進行了四項小型研究，結果發現在這四項研究中，多數受訪者均認為說服訊息對別人的影響力，大於

對自己的影響力 (Davison, 1983)。

在Davison發表第三人效果的論文後，第三人效果便成為傳播學者重視的研究題材。依據Perloff (1993) 的分析，在1983年至1992年，學者們共進行了十四項有關第三人效果的研究，其中十三項研究支持第三人效果假設，只有一項研究未獲得支持第三人效果的證據 (Glynn & Ostman, 1988)。

最近的相關研究更顯示，如果媒介訊息是負面的或不需要的，受訪者更會認為該訊息對別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 (Henriksen & Flora, 1999; Perloff 1999; Salwen & Dupagne, 1999)。例如，Gunther (1995) 的研究發現，大多數美國成年人認為色情媒介對別人的負面影響較大，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較小。Rojas等人 (1996) 也發現，受訪的美國大學生認為色情媒介和電視暴力內容對別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即使是在澳洲、亞洲及歐洲進行的研究，也發現受訪者會認為媒介的負面內容對別人的影響，大於對自己的影響 (Duck & Mullin, 1995; Gunther & Hwa, 1996; Hoorens & Ruiter, 1996)。

台灣地區進行的相關研究不多，胡幼偉 (1998) 曾在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期間，用電話訪問1074人，結果發現台北市的選民傾向認為電視、報紙、廣播及雜誌的選舉新聞，對別人投票決定的影響，大於對自己投票決定的影響。此外，作者也在1996年底在台北市訪問了1858位高中學生，結果發現男女受訪學生均傾向認為色情媒介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較小，對別人的影響較大 (Lo & Paddon, 1999)。

由於過去的研究發現無論大學或高中學生均會認為媒介的負面內容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對別人的影響較大，因此，本研究提出的第一個假設如下：

假設 1：受訪的高中和大學生均會認為媒介的負面內容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對別人的影響較大。

二、媒介內容與第三人效果

在Davison (1983) 提出第三人效果假設後，不少傳播學者便進行研究，探討影響「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的因素 (Perloff, 1999; 胡幼偉, 民87)。「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又稱「第三人效果認知」(third-person perception)，是指「媒介對別人影響的認知」(又稱第三人效果)和「媒介對自己影響的認知」(又稱第一效果)間的差距，兩者差距愈大，表示「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如果受訪者認為媒介對自己的影響大於對別人的影響，則稱為「顛倒的第三人

效果」(reversed third-person effect)。

學者們的研究發現，有許多因素可能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其中媒介內容的需要與不需要性，是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的重要因素。Perloff (1999) 回顧過去的相關文獻，發現共有六項研究比較需要(desirable)與不需要(undesirable)訊息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其中有四項研究指出，不需要的訊息會造成較大的「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有兩項研究指出，需要的訊息不僅不會造成較大的「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甚至會造成「顛倒的第三人效果」。

例如，Gunther與Mundy (1993) 以73位威斯康辛大學的學生為受試對象，要求他們評估四種可能有利的訊息及四種可能有害的訊息。這八種訊息均刊登在報紙或雜誌上，其中四種可能有利的訊息為：安全日光浴秘訣、使用安全帶的建議、高血壓危險的警示、建議每天吃燕麥以降低膽固醇；四種可能有害的訊息為：樂透獎與獲獎技巧、睡覺時可以減肥的藥丸的新聞、家庭郵購事業能迅速致富的消息、蛋白乳液能強化頭髮的文章。他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受試者認為這四種可能有利的訊息，有兩種對自己的影響，大於對別人的影響，另外兩種則對自己和別人的影響差距不大；但對四種可能有害的訊息，受試者均認為這些訊息對別人的影響，大於對自己的影響。

Gunther與Mundy (1993) 的研究是以美國大學生為受試對象，Duck與Mullin (1995) 則在澳洲進行兩項相關實驗，第一個實驗以112位澳洲大學生為受試對象，要求他們比較三種媒介內容(負面內容、正面內容及公共服務宣導內容)對自己及別人的影響，結果發現受試者認為公共服務宣導內容對自己的影響大於對別人的影響。此外，受試者也認為媒介的負面內容和正面內容對別人的影響，大於對自己的影響，但負面的內容比正面的內容所造成的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較大。

Duck和Mullin的第二個實驗，以在一購物中心隨機抽選的64位澳洲民眾為受試對象，要求受試者比較媒介暴力內容和酒醉駕車宣導內容對自己及別人的影響，結果發現受試者認為媒介暴力內容對別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但受試者認為酒醉駕車內容對自己及別人的影響差距不大。換言之，媒介暴力內容比酒醉駕車宣導內容會產生較大的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另一項相關研究，是Hoorens和Ruiter (1996) 在荷蘭進行的研究。他們以120位提爾伯格大學的學生為受試對象，比較需要的訊息和不需要的訊息的第三人效果。他們選擇六種需要的訊息(交通安全、犯罪預防、器官捐贈、環保、人權組織、慢性病研究基金)及六種不需要的訊息(軍火業交易、調製雞尾酒、極端右翼政黨、誹謗重要政客的訊息、清潔劑、把開發中國家當成豪華的渡假去處)。結果發現，受試者認

為不需要的訊息對別人的影響，大於對自己的影響；需要的訊息則會造成顛倒的第三人效果——受試者認為這些需要的訊息對自己的影響大於對別人的影響。

除了美國、澳洲及歐洲的研究外，Gunther與Hwa（1996）也曾在新加坡訪問506位成年人，比較不需要的電視內容（裸體、婚外性行為、同性戀、婚前性行為、未婚媽媽、暴力、髒話、長髮男子等）和需要的電視內容（外國節目、宗教節目）的第三人效果。結果發現，受訪者認為不需要的電視內容對別人的影響，大於對自己的影響；需要的內容對自己的影響，大於對別人的影響。

上述研究均以大學生或成年人為研究對象，唯一以未成年人為研究對象的是Henriksen與Flora（1999）的研究，他們把666位美國兒童隨機分為兩組，一組收看香煙廣告，一組收看反香煙廣告，結果發現受試者認為香煙廣告（不需要訊息）對別人的影響大於對自己的影響，而受試者也認為反香煙廣告（需要的訊息）對自己的影響大於對別人的影響。

回顧過去的研究，可以看出幾乎所有的研究，都針對需要與不需要媒介內容的第三人效果進行比較分析，絕大多數的研究都發現，不需要的媒介內容會造成較大的第三人效果認知，需要的媒介內容則不僅不會造成第三人效果認知，甚至可能造成顛倒的第三人效果。

為什麼人們會認為不需要的媒介內容對別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合理的解釋之一，是人們有一種「自我膨脹」（self-enhancement）的傾向，人們會傾向認為自己比別人更能抗拒說服性訊息，更不易受到負面訊息的影響（Gunther & Mundy, 1993; Henriksen & Flora, 1999）。這種「自我膨脹」的傾向，可以使人們覺得自己高人一等，比別人聰明，因而得以強化自尊及自我的價值。

例如，過去的研究發現，人們會傾向高估和自己意見相同者的人數，認為自己的能力高於一般平均的人，並認為自己的個性比別人好（Henriksen & Flora, 1999; Taylor & Brown, 1988）。「自我膨脹」可以幫助人們保護自己的形象，維護樂觀的期望，並使人們產生得以掌控事件的感覺。

Henriksen與Flora（1999）指出人有三種自我膨脹的偏差，第一種是「不切實際的樂觀」（unrealistic optimism），這種偏差使人們傾向認為自己比較不會遭遇不幸的事，也比較不會受到不幸事件的負面影響（Weinstein, 1989）。例如，Whalen等人（1994）的研究發現，高中生認為自己會酗酒、自殺、患心臟病或患癌症、愛滋病的機率比同學低；即使是10歲到13歲的兒童，也會認為自己患愛滋病、心臟病、癌症的機率比其他同年的兒童低。

第二種自我膨脹的偏差是「虛幻的優越感」(illusory superiority)，這種偏差是指人們會用一種比較正面的方式，使自己看起來高人一等或比別人幸運(Alicke, 1985)。人們也會傾向使自己的個性、特質、能力、生活情形看起來比別人好，Falko等人(1997)的研究便發現，即使是兒童也會展現「虛幻的優越感」，當研究人員請兒童用一些正面及負面的特色來描述自己、同學、父母及老師時，兒童會用比較正面的特色來描述自己。

第三種自我膨脹的偏差是「自我服務的歸因」(self-serving attribution)，人們在事情結果順遂時，會盡量誇大自己的功勞；當結果不如人意時，又會設法避免責難(Weiner, 1974)。這種偏差造成人們善於居功諉過、推諉責任。

由於人們有「自我膨脹」的傾向，會認為自己高人一等，比別人更睿智，更能抗拒媒介內容的負面影響。因此，媒介內容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愈大，人們應該會更傾向認為自己的免疫力較高，比較不容易受到媒介內容的不良影響。

過去的研究從未針對媒介負面內容的第三人效果進行比較分析，本研究認為媒介負面內容可能造成不良影響的嚴重程度，會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媒介負面內容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愈嚴重，人們會愈傾向認為該媒介內容對別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換言之，媒介負面內容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愈大，「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如下：

假設2：媒介的負面內容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愈大，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

三、社會距離與第三人效果

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指的是自己和他人間的距離。依據Perloff(1993)的分析，「社會距離」可以用兩種方式來加以表現。第一種方式是評估自己和他人的相似程度，自己和他人愈相似，距離愈近，因此評估方法，是把「社會距離」放在一個量表(continuum)上加以測量，量表的一端是「很像我」，另一端是「一點都不像我」。另一種方式則是評估自己和他人的差異性，差異性愈小，距離愈近。評估方法也是用量表來測量自己和他人的社會距離，量表的一端是「我最接近(closest)的團體或社區」，另一端是「我最大(largest)的團體或社區」。

過去的研究顯示，第三人效果的強度會隨自己和他人的距離而有所不同(Cohen et al., 1988)。換言之，受訪者會認為媒介內容對比較像自己或和自己比較接近的他

人（團體）影響較小，對比較不像自己或和自己距離較遠的他人（團體）影響較大。

但去的研究在社會距離與第三人效果認知方面的研究發現並不一致。例如，Gunther（1991）的研究發現，明尼蘇達大學的學生認為負面的新聞報導對其他明尼蘇達州的居民影響較大，對其他明尼蘇達大學的學生影響較小。Cohen和Davis（1991）則發現，受訪者認為負面政治廣告對本州、本區及全國一般民眾的影響並無差異。McLeod等人（1997）的研究發現，受訪的達拉維瓦大學生認為反社會抒情詩歌對紐約和洛杉磯的年輕人影響最大，對其他達拉維瓦大學的學生影響較小；但反社會抒情詩歌對其他達拉維瓦大學的學生和一般美國民眾的影響並無差異。

從上述研究，可以看出過去探討社會距離和第三人效果的研究不多，研究發現卻有相當的歧異。主要的原因，可能因為過去的研究均以大學生為受訪對象，要求受訪的大學生比較媒介訊息對同校同學和其他民眾的影響。

由於過去的研究，對其他民眾（距離較遠的團體）的定義不同，有的研究指同州的居民，有的指一般美國民眾，也有的指其他地區的年輕人，因此造成研究發現的歧異。在Gunther（1991）的研究中，明尼蘇達大學的受訪學生認為負面新聞報導對其他明尼蘇達大學生的影響較小，對明尼蘇達州居民的影響較大，可能是因為受訪者認為其他明尼蘇達大學生的教育程度較高，因此比較不容易受負面新聞報導的影響。而在McLeod等人（1997）的研究中，達拉維瓦大學的受訪學生認為反社會抒情詩歌對其他達拉維瓦大學的學生及美國一般民眾的影響較小，對紐約及洛杉磯的年輕人影響較大，可能是因為受訪者認為年輕人較易受反社會抒情詩歌的影響，而其他達拉維瓦大學的學生和美國一般民眾的年齡較大，因而比較不會受到影響。

因此，教育程度和年齡可能是影響社會距離認知的重要因素，而過去的研究在探討社會距離和第三人效果間的關係時，均未仔細考慮教育程度和年齡可能造成的影響，因此造成研究發現的歧異。有鑑於此，本研究嘗試在控制教育程度和年齡的情形下，分析社會距離對第三人效果認知的影響。本研究認為人們會傾向認為媒介的負面內容和對自己年紀及教育程度相似的人影響較小，對比自己年輕、教育程度低的人影響較大。因此，本研究的第三個假設如下：

假設3：社會距離會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大學受訪學生會傾向認為媒介的負面內容對一般大學生的影響較小，對一般高中生的影響較大；高中受訪學生會傾向認為媒介的負面內容對一般高中生的影響較小，對一般國中生的影響較大。

四、第三人效果與支持限制媒介

第三人效果廣受傳播學者重視，是因為第三人效果可能產生行為層面的影響力。Davison（1983）認為第三人效果是造成某些行為的主要原因。他指出，當閱聽人聽到某種物質短缺的報導，他們便會擔心這項報導會促使其他的人搶購該物資，因而造成閱聽人自己採取行動搶購該物資。此外，審查資訊的人（censor）查禁某些資訊的主要理由，是為了保護大眾不受這些不良資訊的影響。事實上，審查資訊的人本身並未受這些被查禁資訊的影響，他們的親友也未受影響。但審查資訊的人卻仍然認為這些被查禁的資訊，可能會對大眾的道德、信仰產生不良的影響。

雖然第三人效果的重要性是建立在對行為層面的影響之上，但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探討第三人效果對行為層面的研究卻很少（Salwen & Driscoll, 1996；Perloff, 1993）。一直到1995至1996年的「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學會」（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與「國際傳播學會」（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才見到學者們發表探討第三人效果對行為層面影響的論文（Salwen & Driscoll, 1996）。

在第三人效果對行為的影響方面，以Gunther（1995）的研究最具影響力，他的研究採隨機抽樣，並用電話訪問648位18歲以上的美國成年人，以探討第三人效果與支持限制色情媒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大多數受訪者認為色情媒介對別人的不良影響較大，對自己的不良影響較小。

為了分析第三人效果對行為的影響，Gunther用「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來預測人們對限制色情媒介的支持程度。Gunther認為是「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導致某些態度和行為的反應。他認為，當人們覺得媒介內容對「自己的負面效果」和對「他人的負面效果」間的距離加大，便會認為媒介內容的負面社會效果擴大，因而覺得必須採取行動限制媒介內容。因此，他認為是「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促使人們採取行動，來限制媒介內容。

為了更進一步分析「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對支持限制媒介的影響力，他選擇樣本中認為色情媒介對別人的影響比對自己的影響大的受訪者，進行迴歸分析，結果發現，在所有的預測變項中，「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是預測支持限制色情媒介的最有力變項。

在Gunther發表這篇論文後，後續研究幾乎全部用「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來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態度與行為。例如，Rojas等人（1996）以133位大

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第三人效果和支持限制媒介的態度與行為間的關聯性。他們在研究中把依變項「支持限制媒介的態度」分為：支持限制「一般媒介」、「電視的暴力內容」及「色情媒介」三種。另一個依變項「支持限制色情媒介的行為」，Rojas等人則詢問受訪者：「如果在一個鄰近的社區中，採用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禁止色情素材，你會投票贊成或反對禁止色情素材？」他們並詢問受訪者是否會採取其它行動（如和別人討論、寫信給政府官員、參加活動、抗議、抵制或其它限制色情素材的活動）。

他們的研究發現，在控制人口變項、媒介使用、宗教、女權主義、權威、保守等態度變項的情形下，「第一人效果 and 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是預測支持限制「一般媒介」、「電影暴力內容」、「色情媒介」的顯著預測變項。

另外一項研究（Salwen, 1997）用電話訪問549位18歲以上的美國成年人，也發現類似的結果。Salwen探討在199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大眾對媒介影響力的認知與支持限制媒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絕大多數的受訪者認為媒介的報導對其他人的看法影響較大，對自己的看法影響較小。在限制媒介方面，他的研究也發現，「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是預測支持政府禁止不公平新聞及有關總統候選人的不公平廣告與民意調查的顯著變項。此外，Salwen的這項研究也比較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對支持限制媒介的預測力。結果發現第三人效果是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顯著變項，而第一人效果並非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顯著變項。

雖然上述三項研究發現「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是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態度與行為之顯著預測變項，但也有一些研究發現不同的結果。例如，Lee與Yang（1996）探討第三人效果和支持限制媒介色情內容間的關聯性，結果發現，第一人效果（受訪者認為媒介對自己的影響）是預測支持限制電視色情內容的最有力變項，第三人效果在預測支持限制電視網的色情內容方面效果較大，但在預測支持限制有線電視色情內容上效果較小。換言之，第一人效果比第三人效果在預測支持限制色情內容方面，更具預測力。

此外，Salwen與Driscoll（1997）用電話訪問605位美國成年人，探討第三人效果和支持限制媒介對辛普森案報導的關係。結果發現，多數受訪者認為媒介對辛普森案的報導，對別人的影響大於對自己的影響。但他們的研究卻發現，「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和支持限制媒介報導辛普森案，並無顯著的關聯性。即使模倣Gunther（1995）只選擇樣本中認為媒介報導對別人的影響比對自己的影響大的受訪者，進行迴歸分析，「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仍非預測「支持限制媒

介」的顯著變項。

從上述文獻分析中，可以看出過去國外進行的相關研究，在探討第三人效果與支持限制媒介的關係時，研究發現有若干不一致之處。有些研究發現「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是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顯著變項（Gunther, 1995; Rojas et al., 1996），有些研究則發現「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並非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顯著變項（Salwen & Driscoll, 1997）。因此，後續研究有必要澄清在那些情況下，「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可以或不可以預測支持限制媒介。

本研究認為，「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並非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適當變項。因為「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無法有效區分下列兩類受訪者：第一類是認為媒介對自己及其他人都有很大負面影響的受訪者，另一類是認為媒介對自己及他人都沒有太大影響的受訪者。

作者曾在另一篇論文中（Lo & Paddon, 1998），用四個類型圖（typology）來說明，「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並非預測支持限制色情媒介的適當變項。

		對他人影響的認知 (Perceived effects on others)		合計
		高	低	
對自己影響的認知 (Perceived effects on self)	高	第一類 N=741(3.40)	第二類 N=295(3.06)	N=1036(3.30)
	低	第三類 N=216(3.21)	第四類 N=596(2.88)	N= 812(2.96)
合計		N=957(3.36)	N=891(2.94)	N=1848(3.15)

圖一：對色情媒介影響的四種認知類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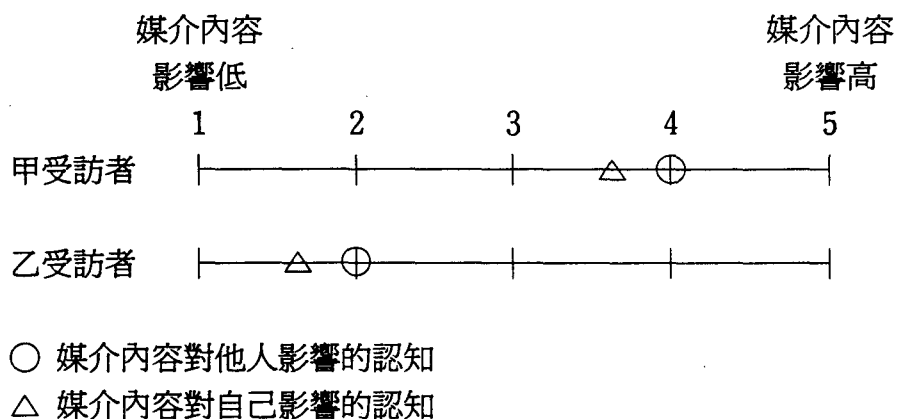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Lo & Paddon, 1998, p. 24.

註釋：括號內的數字是支持限制媒介的平均數

圖一顯示四種類型的受訪者，第一種類型的受訪者認為色情媒介對自己及他人都有較大的負面影響；第二種類型的受訪者認為色情媒介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較大，對別人的負面影響較小；第三種類型的受訪者認為色情媒介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較小，但對他人的負面影響較大；第四種類型的受訪者則認為色情媒介無論對自己及他人均無太大的負面影響。

如果「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是預測限制色情的有力變項，則第三類的受訪者應該最支持限制色情媒介，第二類受訪者將最不支持限制色情媒介，而第一類和第四類受訪者在支持限制色情媒介的態度方面，將無顯著的差異。

然而作者的研究卻顯示，第一類和第三類的受訪者最支持限制色情媒介，但這兩類受訪者對限制色情媒介的支持程度，並無顯著差異。第二類和第四類的受訪者較不支持限制色情媒介，而這兩類受訪者對限制色情媒介的支持程度也沒有顯著的差異。這樣的發現充分顯示，「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並非預測支持限制色情媒介的適當變項。



圖二：媒介內容對自己及他人影響的認知圖

圖二更進一步說明為什麼「第一人效果與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並非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適當變項。在圖二中，甲受訪者認為媒介內容「對他人的負面影響」（4.0分）及「對自己的負面影響」（3.8分）均很高，乙受訪者認為媒介內容對「他人」（2.0分）及「自己」（1.8分）的負面影響都很低，但這兩位受訪者的「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卻相等（均為0.2分）。而從第三人效果理論及過去的研究證據來看（Lo & Paddon, 1998），甲受訪者均遠比乙受訪者支持限制媒介。但如果用「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來預測甲、乙受訪者支持限制媒介的態

度，則會誤認為甲、乙兩人的支持程度相等。圖二清楚說明對任何可能造成負面影響的題材，「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均非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可靠變項。因此，本研究第四個假設如下：

假設 4：「第一人效果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無法可靠地預測支持限制媒介。

參、研究方法

一、抽樣方法及問卷調查

本研究採多階集群抽樣（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從台北市所有的高中（職）及大學中，隨機抽出十所高中（職）及十所大學，並從每所被抽中的學校中，隨機各抽出三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總共訪問了六十班、2713位學生。

二、媒介的負面內容

本研究選擇有線電視色情節目、電視暴力影片及電視靈異節目作為媒介負面內容的代表，因為近年來這三類電視節目在台灣飽受社會各界批評與關切，這三類電視節目均被認為可能對社會風氣及一般民眾的觀念、態度及行為產生不良影響。為了解這三類電視節目的負面影響程度，本研究曾進行兩次預測，每次預測共訪問高中及大學生各兩班，這兩次預測結果均顯示，受訪者認為有線電視色情節目對「自己」及「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最大，電視暴力影片對「自己」及「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次之，電視靈異節目對「自己」及「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最小。Paired t檢定發現所有的差異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正式訪問的結果，請參考資料分析及表五）。

三、研究變項

本研究的研究變項包括人口變項、媒介使用時間、相關媒介（電視節目）收視頻率、第三人效果變項及支持限制媒介（電視節目）等，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人口變項

本研究採用的人口變項有性別、學業成績、宗教信仰等。性別分為男、女；學業成績指受訪者在班上的平均學業成績，分為①前10名，②11至20名，③21至30名，④30名以後；宗教信仰分為：①沒有宗教信仰，②有宗教信仰但不虔誠，③有宗教信仰而且還算虔誠，④有宗教信仰而且相當虔誠。這三個人口變項在迴歸分析中作為控制變項，因為過去的研究顯示他們會影響人們支持限制媒介的態度（Lo & Paddon,

1998; Thompson et al., 1990)。

(二) 電視收視時間

本研究測量受訪者下列二類電視收視時間①收看電視時間，②收看有線電視時間。調查時採用下列兩個題項來詢問受訪者：①平均每星期有幾天會（收看電視，收看有線電視）；②平均每天花多少時間（收看電視，收看有線電視）。計算電視收視時間的方法，是把受訪者「平均每星期收看電視的天數」乘以「平均每天收看電視的時間」。

(三) 相關電視節目收視頻率

相關電視節目收視頻率指下列三類電視節目之收視頻率①電視暴力影片，②有線電影色情節目，③電視靈異節目。測量方法採單一題項詢問受訪者是否經常收看上述三類節目；回答方式由受訪者從①從不看，②很少看，③偶爾看，④有些常看，⑤經常看，五個答案中選擇一個答案。電視收視時間和相關電視節目視頻率也在迴歸分析中作為控制變項，因為過去的研究顯示，媒介暴露頻率和第三人效果及支持限制媒介相關（Hoffner et al., 1999）。

(四) 第三人效果變項

本研究採用的第三人效果變項，共分為三類①「對自己的負面影響」，②「對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③「對年紀較小學生的負面影響」，測量方法如下：

「對自己的負面影響」指受訪者認為媒介內容對自己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又稱「第一人效果認知」（perceived first-person effects）。本研究測量「對自己的負面影響」的方法，是詢問受訪者三類電視節目（電視暴力影片、有線電視色情節目、電視靈異節目）會不會對受訪者自己的下列事項產生不好的影響：①道德觀念，②價值觀念，③態度，④行為。

「對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指受訪者認為媒介內容對其他同學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就大學生而言，本研究詢問受訪者此三類電視節目會不會對其他一般大學生的下列事項產生不好的影響：①道德觀念，②價值觀念，③態度，④行為；對高中生則詢問上述三類電視節目會不會影響其他一般高中生的①道德觀念，②價值觀念，③態度，④行為。

「對年紀較小學生的負面影響」指受訪者認為媒介內容對年紀較小、學級較低的學生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就大學生而言，本研究詢問受訪大學生上述三類電視節目會不會對一般高中生的下列事項產生不好的影響：①道德觀念，②價值觀念，③態度，④行為；對受訪高中生，則詢問上述三類電視節目會不會對一般國中生的下列事

項產生不良的影響：①道德觀念，②價值觀念，③態度，④行為。

爲了檢驗測量「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對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及「對年紀較小學生的負面影響」題項的效度與信度，本研究採用「主成份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與Cronbach's alpha兩種方法。表一至表三呈現主成份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無論就「暴力電影影片」、「有線電視色情節目」及「電視靈異節目」等三類電視節目而言，測量「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對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及「對年紀較小學生的負面影響」的題項，均清楚分成三個因素。

表一：測量電視暴力影片「對自己的影響」、「對其他同學的影響」、「對其他年紀較小學生的影響」認知題項的主成份因素分析（用Varimax方法轉軸）

題項	因素負荷量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年小學生			
態度	.90	.29	.12
行為	.88	.30	.12
道德觀念	.88	.32	.12
價值觀念	.87	.32	.13
其他同學			
態度	.32	.87	.18
價值觀念	.21	.86	.19
行為	.32	.85	.14
道德觀念	.33	.84	.20
自己			
態度	.10	.15	.91
行為	.11	.11	.88
道德觀念	.11	.17	.88
價值觀念	.11	.17	.88
愛根值	6.56	2.54	1.21
可解釋變異量	54.7 %	21.1 %	10.1 %
全部可解釋變異量	85.9 %		
Cronbach's alpha	.96	.95	.93

表二：測量有線電視色情節目「對自己的影響」、「對其他同學的影響」、「對其他年紀較小學生的影響」認知題項的主成份因素分析（用Varimax方法轉軸）

題項	因素負荷量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其他同學			
態度	.90	.11	.32
行爲	.87	.12	.31
道德觀念	.87	.13	.33
價值觀念	.87	.14	.34
自己			
態度	.12	.93	.15
價值觀念	.11	.92	.16
道德觀念	.12	.90	.16
行爲	.09	.90	.14
年小學生			
態度	.34	.18	.86
價值觀念	.33	.20	.85
道德觀念	.35	.20	.85
行爲	.33	.16	.85
愛根值	6.77	2.62	1.11
可解釋變異量	56.5 %	21.8 %	9.2 %
全部可解釋變異量	87.6 %		
Cronbach's alpha	.95	.95	.96

表三：測量電視靈異節目「對自己的影響」、「對其他同學的影響」、「對年紀較小學生的影響」認知題項的主成份因素分析（用Varimax方法轉軸）

題項	因素負荷量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年小學生			
價值觀念	.89	.14	.30
態度	.88	.14	.32
道德觀念	.88	.16	.29
行為	.87	.14	.32
自己			
價值觀念	.14	.90	.18
態度	.12	.89	.15
道德觀念	.14	.88	.19
行為	.11	.86	.19
其他同學			
態度	.32	.20	.86
行為	.32	.19	.84
道德觀念	.33	.23	.84
價值觀念	.33	.22	.84
愛根值	6.84	2.33	1.16
可解釋變異量	57.0 %	19.4 %	9.7 %
全部可解釋變異量	86.1 %		
Cronbach's alpha	.96	.93	.95

根據主成份因素分析的結果，本研究依照上述三類電視節目的「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對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及「對年紀較小學生的負面影響」，共建構下列九個指標：①「暴力電視對自己的負面影響」、②「暴力電視對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③「暴力電視對年紀較小學生的負面影響」④「有線電視色情節目對自己的負面影響」、⑤「有線電視色情節目對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⑥「有線電視色情節目對年紀較小學生的負面影響」、⑦「電視靈異節目對自己的負面影響」、⑧「電視靈異節目對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⑨「電視靈異節目對年紀較小學生的負面影響」。

建構上述九個指標的方法，是把受訪者在各指標的四個題項（①道德觀念，②價值觀念，③態度，④行爲）的得分加起來除以4。受訪者在各指標上的得分愈高，表示受訪者認為影響愈大。

（五）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測量方法是把受訪者在「對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上的得分，減去受訪者在「對自己的負面影響」上的得分。相減後的分數愈高代表「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第三人效果認知強度愈高）。

（六）支持限制媒介（電視節目）

本研究把受訪者支持限制媒介這個變項，由支持限制下列三類電視節目作為代表：①電視暴力影片，②有線電視色情節目，③電視靈異節目。測量受訪者支持限制這三類電視節目的方法，是分別詢問受訪者：「如果台灣各界正在討論（電視暴力影片，有線電視色情節目，電視靈異節目）對社會的影響，你會不會採取下列行動：①簽名要求電視公司不要播出，②打電話給電視公司要求不要播出，③寫信給立委要求立法禁止播出，④參加抗議活動，⑤抵制不看。受訪者回答的方式，是從①一定不會，②可能不會，③不確定，④可能會，⑤一定會，五個答案中選擇一個答案。

主成份因素分析及Cronbach's alpha的結果顯示，測量受訪者支持限制這三類電視節目的題項，均呈現一個因素，而且alpha值相當高（參見表四）。因此，本研究共建構下列三個指標①「支持限制電視暴力影片」（平均數=2.34，標準差=.91），②「支持限制有線電視色情節目」（平均數=2.53，標準差=1.04），③「支持限制電視靈異節目」（平均數=2.19，標準差=.95）。建構上述三個指標的方法，是把受訪者在各指標的五個支持限制方式題項的得分加起來除以5。受訪者在各指標上的得分愈高，表示愈支持限制各類電視節目。

表四：測量支持限制各題電視節目題項的主成份因素分析

題項（暴力電視影片）	因素負荷量
打電話	0.87
寫信給主委	0.85
參加抗議活動	0.78
簽名	0.77
抵制不看	0.73
愛根值	3.20
可解釋變異量	64.0 %
Cronbach's alpha	0.85
題項（有線電視色情節目）	因素負荷量
打電話	0.88
寫信給主委	0.85
簽名	0.81
參加抗議活動	0.79
抵制不看	0.77
愛根值	3.38
可解釋變異量	67.5 %
Cronbach's alpha	0.87
題項（電視靈異節目）	因素負荷量
打電話	0.90
寫信給主委	0.87
參加抗議活動	0.83
簽名	0.82
抵制不看	0.75
愛根值	3.50
可解釋變異量	70.0 %
Cronbach's alpha	0.88

四、正式訪問

正式訪問在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十九日至五月二十日進行，由十六位訪員赴被抽選出學校的各班，利用上課或課餘時間，在班上對全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這十六位訪員全部是國立政治大學的學生，訪問前均曾接受訪員訓練，總共訪問了2,713人，回收的有效問卷有2,628份，其中高中生有1,335人，佔50.8%；大學生有1,293人，佔49.2

%。男生有1,414人佔55%；女生有1,182人，佔45%。

肆、資料分析

本研究共提出四個假設，假設驗證的結果如下：

一、假設一驗證

本研究的假設一預測：無論高中或大學受訪學生都會認為媒介的負面內容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對其他同學的影響較大。表五呈現資料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高中或大學受訪學生，均認為電視色情、暴力、靈異節目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對其他同學的影響較大。paired t檢定顯示，所有的差異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 < .001$ ）。本研究的第一個假設獲得有力的支持。

二、假設二驗證

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預測：媒介負面內容可能造成的不良影響愈大，「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為了驗證這個假設，本研究進行了一系列的paired t檢定。從表五中可以看出，無論是高中樣本、大學生樣本或全部樣本，受訪者均認為有線電視色情節目對「自己」、「其他同學」及「其他年紀較小學生」的負面影響最大，電視暴力節目的負面影響居次，電視靈異節目的負面影響最小。paired t檢定也顯示所有的差異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 < .05$ ）。

就三種電視節目所造成的「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而言，表六顯示，無論是對「其他同學和自己」影響的認知差距，或對「年紀較小學生和自己」影響的認知差距，在高中生、大學生及全部樣本中，有線電視色情節目所造成的認知差距均最大，電視暴力節目居次，電視靈異節目所造成的認知差距均為最小，而且所有的差距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唯一的例外是高中生樣本中，有線電視色情和電視暴力節目所造成的認知差距非常接近，兩者的差異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 > .05$ ）。因此，本研究的第二個假設大致獲得支持。

三、假設三驗證

本研究的第三假設預測：社會距離會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大學受訪學生會傾向認為媒介的負面內容對一般大學生的影響較小，對一般高中生的影響較大；高中受訪學生會傾向認為媒介的負面內容對一般高中生的影響較小，對一般國中生的影響較大。本研究仍然用系列paired t檢定來驗證這個假設，表六呈現這些t檢定的結果。

從表六可以看出，無論是高中生樣本、大學生樣本或全部樣本，也無論是有線電視色情節目、電視暴力節目或電視靈異節目，「年紀較小學生和自己」的認知差距，均大於「其他同學和自己」的認知差距，而且這些差異全部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001$ ）。換言之，高中受訪學生會認為這三類電視節目對其他一般高中生的影響較小，對其他一般國中生的影響較大；而大學受訪學生則會認為這三類電視節目對其他一般大學生的影響較小，對其他一般高中生的影響較大。本研究的第三個假設也獲得強有力的支持。

表五：電視節目對自己、其他同學、其他年紀較小學生的負面影響之平均數、標準差及 t 檢定

高中生樣本		對自己、其他同學、其他年紀較小學生影響之認知		
電視節目	人數	自己	其他同學	其他年紀較小學生
色情節目	1334	1.92(1.17)	3.45(1.19)	3.96(1.09)
暴力節目	1334	1.81(1.02)	3.18(1.13)	3.83(1.08)
靈異節目	1334	1.74(.99)	2.20(1.04)	2.61(1.12)
大學生樣本				
色情節目	1292	1.99(1.12)	3.18(1.10)	3.89(.99)
暴力節目	1292	1.91(1.03)	2.84(1.06)	3.65(1.01)
靈異節目	1292	1.80(.99)	2.31(1.02)	2.88(1.08)
全部樣本				
色情節目	2626	1.95(1.14)	3.31(1.15)	3.92(1.04)
暴力節目	2626	1.86(1.02)	3.01(1.11)	3.74(1.05)
靈異節目	2626	1.77(.99)	2.26(1.03)	2.74(1.11)

註：1. 表中括號前的數字為平均數，括號內的數字為標準差。

2. 無論是高中生樣本、大學生樣本或全部樣本，用paired t 檢定分析電視色情、暴力、靈異節目「對自己」、「對其他同學」及「對其他年紀較小學生」間的差異，均達到統計上 $p<.001$ 的水準。
3. 無論是高中生樣本、大學生樣本或全部樣本，用paired t 檢定分析均發現受訪者認為電視色情節目「對自己」、「對其他同學」、「對其他年紀較小學生」的影響最大，電視暴力節目的影響力居次，電視靈異節目的影響力最小，所有的差異均達到統計上 $p<.05$ 的顯著水準。

表六：各類電視節目對「自己」、「其他同學」、及「其他年紀較小學生」
影響的第三人效果認知之t檢定

高中生樣本		認知差距		
電視節目	人數	其他同學—自己	年紀較小學生—自己	t值
色情節目	1334	1.53(1.32)	2.04(1.36)	21.20***
暴力節目	1334	1.37(1.22)	2.03(1.26)	26.91***
靈異節目	1334	.46(1.07)	.87(1.23)	16.82***
大學生樣本				
色情節目	1292	1.19(1.19)	1.90(1.23)	28.87***
暴力節目	1292	.93(1.12)	1.74(1.19)	31.46***
靈異節目	1292	.51(1.06)	1.08(1.17)	23.02***
全部樣本				
色情節目	2626	1.36(1.27)	1.97(1.30)	35.15***
暴力節目	2626	1.15(1.19)	1.89(1.24)	41.17***
靈異節目	2626	.49(1.06)	.97(1.20))	28.06***

註：1. 表中括號前的數字為平均數，括號內的數字為標準差。

2. *** $p < .001$

3. 就「其他同學和自己」的認知差距而言，三組樣本中電視色情節目所造成的認知差距均最大，電視暴力節目次之，電視靈異節目最少，paired t 檢定顯示，所有的差異均達到統計的顯著水準 ($p < .05$)。

4. 就「年紀較小學生和自己」的認知差距而言，三組樣本中，也以電視色情節目所造成的認知差距最大，電視暴力節目居次，電視靈異節目最小。pairs t 檢定顯示，只有高中樣本中，電視色情節目和暴力節目所造成的認知差距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 > .05$)，其他所有的差異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p > .05$)。

四、假設四驗證

本研究的第四個假設預測：「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無法可靠地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為了驗證這個假設，本研究針對高中生樣本和大學生樣本各進行六次

階層迴歸分析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表七及表八呈現這些階層迴歸分析的結果。在這十二次迴歸分析中，第一層輸入的均是性別、學業成績、宗教信仰等人口變項；第二階層輸入的是收看電視時間、收看有線電視時間及收看相關電視節目（電視色情、暴力、靈異節目）頻率等電視節目收視變項；最後一個階層輸入的是第三人效果變項，其中高中生樣本和大學生樣本的一、三、五次迴歸分析，均只輸入「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第二、四、六次迴歸分析，則把「對自己負面的影響」與「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同時輸入迴歸方程式。迴歸分析的結果如下：

（一）支持限制有線電視色情節目

表七、八左邊第一列 (column) 的數字呈現高中生樣本和大學生樣本的第一次迴歸分析結果，依變項是「支持限制有線電視色情節目」，可以看出在第一階層的人口變項中，性別是預測支持限制有線電視色情節目的最強變項（高中樣本Beta= -.31, $p<.001$ ；大學樣本Beta= -.23, $p<.001$ ），顯示女性比男性支持限制電視色情節目。此外，宗教信仰也是預測支持限制有線電視色情節目的顯著變項（高中樣本Beta=.09, $p<.001$ ；大學樣本Beta=.08, $p<.01$ ），表示宗教信仰愈虔誠，愈支持限制有線電視色情節目。

在第二階層中，只有收看相關電視節目（收看有線電視色情節目的頻率）是預測支持有線電視色情節目的顯著變項（高中樣本Beta= -.25, $p<.001$ ；大學樣本Beta= -.27, $p<.001$ ），表示愈常收看有線電視色情節目，愈不支持限制有線電視的色情節目。

第三階層只輸入「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為預測變項，結果發現「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並非預測支持限制有線電視色情節目的顯著變項（高中樣本Beta=.05, $p>.05$ ；大學樣本Beta=.02, $p>.05$ ）。

表七、八左邊第二列 (column) 的數字呈現第二次迴歸分析的結果，依變項仍是「支持限制有線電視色情節目」，第一階層和第二階層的分析結果，和第一次迴歸分析的結果相似，只有性別、宗教信仰及收看相關電視節目（有線電視色情節目收視頻率）是預測支持限制有線電視色情節目的顯著變項。第三階層則同時輸入「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與「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兩個預測變項，結果顯示在控制人口變項及電視收視變項後，「對自己的負面影響」（高中樣本Beta=.18, $p<.001$ ；大學樣本Beta=.13, $p<.001$ ）與「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高中樣本Beta=.15, $p<.001$ ；大學樣本Beta=.09, $p<.01$ ）均為預測支持限制有線電視色情節目的顯著變項。

(二) 支持限制電視暴力影片

表七、八中間兩列 (columns) 的數字呈現第三和第四迴歸分析的結果，依變項是「支持限制電視暴力影片」。可以看出在這兩次的迴歸分析中，性別、宗教信仰和收看相關電視節目 (電視暴力影片收視頻率) 是預測支持限制電視暴力影片的顯著變項，顯示女性、宗教信仰愈虔誠、愈少收看電視暴力節目者，愈支持限制電視暴力影片。

在第三階層中，第三次迴歸分析只輸入「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作為預測變項，結果發現在控制人口變項和電視收視變項後，「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無法顯著預測支持限制電視暴力影片 (高中樣本 $Beta=.04, p>.05$ ；大學樣本 $Beta=.04, p>.05$)。第四次迴歸分析則同時輸入「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與「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兩個預測變項，結果發現在控制人口變項和電視使用變項後，「對自己的負面影響」 (高中樣本 $Beta=.23, p<.001$ ；大學樣本 $Beta=.17, p<.001$) 與「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高中樣本 $Beta=.16, p<.001$ ；大學樣本 $Beta=.12, p<.001$) 亦成為預測支持限制電視暴力影片的顯著變項。

(三) 支持限制電視靈異節目

表七及表八的右邊兩行 (columns) 呈現高中生樣本及大學生樣本的第五、六次迴歸分析結果。在高中生樣本的第一階層和第二階層中，可以看出性別、宗教信仰與收看相關電視節目 (電視靈異節目收視頻率) 是預測支持限制電視靈異節目的顯著變項，顯示女性、宗教信仰愈虔誠、愈不常收看電視靈異節目者，愈支持限制電視靈異節目。然而大學樣本中，只有性別和收看相關電視節目是預測支持限制電視靈異節目的顯著變項。

在第三階層中，這兩組樣本的第五次迴歸分析同樣只輸入「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作為預測變項，結果發現「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是預測支持限制電視靈異節目的顯著變項 (高中樣本 $Beta=.06, p<.05$ ；大學樣本 $Beta=.09, p<.01$)。第六次迴歸分析則同時輸入「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與「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作為預測變項，結果發現這兩個變項均為預測支持限制電視靈異節目的顯著變項，但「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的預測力大幅上升。高中生樣本中，該變項的Beta值在第五次迴歸分析中為.06，在第六次迴歸分析中Beta值增至.15；在大學生樣本，該變項的Beta值在第五次迴歸分析中為.09，在第六次迴歸分析則增至.22。

(四) 「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與「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預測力的比較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如果在迴歸分析的第三階層中只把「第一人和第三人效

果認知差距」輸入迴歸方程式作為預測變項（見第一、三、五次迴歸分析的結果），「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無法預測「支持限制電視色情節目」，也無法預測「支持限制電視暴力影片」，只對「支持限制電視靈異節目」有微弱的預測力。但如果在第三階層中把「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與「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同時輸入迴歸方程式（見第二、四、六次迴歸分析的結果），則不僅「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會變成預測支持這三種電視節目的顯著變項，該變項的Beta值也會大幅提升。

換言之，如果在階層迴歸分析的最後一階層中，只輸入「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變項，認知差距將無法可靠地預測「支持限制媒介」；只有把「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和「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變項同時輸入迴歸方程式時，認知差距才會變成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顯著變項。由於「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的定義，是「對他人的負面影響」減去「對自己的負面影響」之差距，因此「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和「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具有某種程度的關係。

從表九的相關矩陣中可以看出，「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和「支持限制三種電視節目」的相關程度並不高，而「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和「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卻有顯著負相關（相關係數均在 $- .50$ 以上， $p < .001$ ）。從相關分析和階層迴歸分析的結果，可以判斷可能是因為「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和「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具有「多元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使這兩個變項同時輸入迴歸方程式時，造成Beta值大幅增加。因為如果「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和支持限制三類電節目的相關程度不高，不可能在迴歸分析中，會對支持限制這三類電視節目具有顯著的預測力。因此，本研究的第四個假設也大致獲得支持。

表七：人口變項、電視收視及第三人效果變項對支持限制電視節目之階層迴歸分析
(高中生樣本)

自變項	依變項		支持限制電視節目			
	色情節目		暴力節目		靈異節目	
	迴歸分析1	分析2	分析3	分析4	分析5	分析6
第一階層 (人口變項)						
性別	-.31***	-.29***	-.16***	-.14***	-.11***	-.10***
學業成績	.04	.03	.01	.00	.02	.02
宗教信仰	.09***	.08**	.09**	.07**	.11***	.10***
Adjusted R2	.20	.20	.08	.08	.02	.02
第二階層 (電視收視變項)						
收看電視	-.03	-.03	-.06	-.06	-.06	-.05
收看有線電視	-.01	-.00	.02	.03	.01	.01
收看相關電視節目	-.25***	-.24***	-.32***	-.31***	-.34***	-.33***
Adjusted R2	.06	.06	.09	.09	.13	.12
第三階層 (第三人效果變項)						
對自己的影響	×	.18***	×	.23***	×	.13***
認知差距	.05	.15***	.04	.16***	.06*	.15***
Adjusted R2	.00	.02	.00	.04	.00	.02
Total adjusted R2	.26	.28	.18	.21	.15	.16

註：1. 有預測力變項的編碼方式如下：性別（1=男性，2=女性）；宗教信仰（1=沒有宗教信仰，2=有宗教信仰但不虔誠，3=有宗教信仰而且還算虔誠，4=有宗教信仰而且相當虔誠）；收看相關電視節目在迴歸分析1與2中指收看色情節目，在分析3與4中指收看暴力影片，在分析5與6中指收看電視靈異節目等（1=從不看，2=很少看，3=偶而看，4=有些常看，5=經常看）；對自己的負面影響採5點量表（1=沒有影響，5=有非常不好的影響）；認知差距是把「對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減去「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分數愈高，差距愈大。

2. 表格內的Beta值，是所有變項均輸入迴歸方程式後的最後迴歸方程式的Beta值。

表八：人口變項、電視收視及第三人效果變項對支持限制電視節目之階層迴歸分析
(大學生生樣本)

自變項	依變項 支持限制電視節目					
	色情節目		暴力節目		靈異節目	
	迴歸分析1	分析2	分析3	分析4	分析5	分析6
第一階層（人口變項）						
性別	-.23***	-.23***	-.18***	-.17***	-.11***	.10***
學業成績	.03	.03	.04	.04	.05	.04
宗教信仰	.08**	.07**	.09***	.08**	.02	.10
Adjusted R2	.14	.14	.09	.09	.02	.02
第二階層（電視收視變項）						
收看電視	.03	.03	.07	.06	.03	.04
收看有線電視	-.09	-.08	-.12*	-.11*	-.07	-.07
收看相關電視節目	-.27***	-.27***	-.24***	-.23***	-.28***	-.26***
Adjusted R2	.06	.07	.05	.06	.08	.08
第三階層（第三人效果變項）						
對自己的影響	×	.13***	×	.17***	×	.27***
認知差距	.02	.09**	.04	.12***	.09**	.22***
Adjusted R2	.00	.01	.00	.02	.01	.06
Total adjusted R2	.20	.21	.14	.16	.11	.16

註：1. 有預測力變項的編碼方式如下：性別（1=男性，2=女性）；宗教信仰（1=沒有宗教信仰，2=有宗教信仰但不虔誠，3=有宗教信仰而且還算虔誠，4=有宗教信仰而且相當虔誠）；收看相關電視節目在迴歸分析1與2中指收看色情節目，在分析3與4中指收看暴力影片，在分析5與6中指收看電視靈異節目等（1=從不看，2=很少看，3=偶而看，4=有些常看，5=經常看）；對自己的負面影響採5點量表（1=沒有影響，5=有非常不好的影響）；認知差距是把「對其他同學的負面影響」減去「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分數愈高，差距愈大。

2. 表格內的Beta值，是所有變項均輸入迴歸方程式後的最後迴歸方程式的Beta值。

表九：第三人效果變項、認知差距及支持限制媒介的相關矩陣

	高中樣本			大學樣本		
有線電視色情節目	1	2	3	1	2	3
1. 對自己的影響						
2. 對其他同學的影響	.37***			.42***		
3. 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55***	.57***		-.54***	.53***	
4. 支持限制色情節目	.10***	.29***	.17***	.09**	.16***	.07*
電視暴力影片						
1. 對自己的影響						
2. 對其他同學的影響	.36***			.42***		
3. 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50***	.63***		-.51***	.56***	
4. 支持限制暴力影片	.16***	.25***	.10***	.11***	.19***	.08**
電視靈異節目						
1. 對自己的影響						
2. 對其他同學的影響	.44***			.44***		
3. 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	-.49***	.56***		-.51***	.55***	
4. 支持限制靈異節目	.14***	.20***	.07*	.17***	.28***	.11***

* $p < .05$, ** $p < .01$, *** $p < .001$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發現，無論高中或大學受訪學生都認為有線電視色情及電視暴力、靈異節目對別人的影響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這樣的研究發現，再次證明Davison（1983）的第三人效果假設。

當然，本研究最重要的發現，是證明媒介內容的負面程度會影響受訪者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媒介內容的負面程度愈高，所產生的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愈強，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也會愈大；媒介的負面程度較低，所產生的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

愈弱，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也愈小。

這樣的研究發現，不僅擴大了過去第三人效果研究的範圍，也指出值得未來研究重視的一些問題。如果媒介內容的負面程度愈高，所造成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則媒介內容的正面程度愈高，應該會造成較大的顛倒性第三人效果，這是未來的研究值得探究的問題。此外，本研究用三類電視節目作為媒介負面內容的代表，未來的研究應分析各種不同的媒介負面內容（如負面廣告、誹謗性訊息、負面新聞報導等），並在不同的國家地區進行跨文化比較研究，以了解本研究的發現是否能擴及不同的題材，並推論至不同的國家及地區。

本研究的另一重要貢獻，是發現無論高中或大學受訪學生都會認為媒介的負面內容對其他同學的影響較小，對其他年紀較小學生的影響較大。這樣的研究發現証實，在控制年齡與教育程度後，社會距離成為影響第三人效果認知的顯著變項，受訪者會認為媒介負面內容對和自己的社會距離較近的人影響較小，對和自己的社會距離較遠的人影響較大。由於過去的相關研究均未考慮年齡及教育程度可能會影響社會距離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因此造成研究發現的歧異。本研究的這項發現，可能對過去研究的歧異，有若干澄清作用。

在第三人效果認知對行為的影響方面，本研究證實「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並非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可靠變項。過去的研究採用「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的認知差距」（以下簡稱認知差距）來預測支持限制媒介，並未考慮此一變項無法區分兩類受訪者：第一類是認為媒介對自己及他人都有很大影響的受訪者，另一類是認為媒介對自己及他人都沒有太大影響的受訪者。這樣的發現不僅指出過去研究的缺失，也指出未來的研究值得探討的方向。本研究發現，如果在階層迴歸分析中的最後一階層，只輸入「認知差距」，則「認知差距」無法顯著預測支持限制媒介；但如果把「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和「認知差距」同時輸入迴歸方程式，則「認知差距」會變成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顯著變項。

由於「認知差距」的定義是「對他人的負面影響」減去「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認知差距」當然會和「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呈高度相關。換言之，是因為「認知差距」和「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具有「多元共線性」，使「認知差距」和「對自己的負面影響」被同時輸入迴歸方程式時，造成兩者的迴歸係數大幅增加（Neter et al., 1983; Hamilton, 1992）。

從這樣的發現來看，過去的研究（Gunther, 1995; Lee & Yang, 1996; Gunther & Ang, 1996），把「對自己的影響」和「認知差距」同時輸入迴歸方程式，很可能是

因為這兩個變項具有「多元共線性」，才造成「認知差距」的迴歸係數遽增，因而成為預測支持限制媒介的顯著變項。由於過去這些相關研究，均未列出變項間的相關矩陣，也未檢驗變項間是否具有「多元共線性」，因而無法判斷「對自己的影響」和「認知差距」是否具有「多元共線性」。未來探討第三人效果對行為的影響之研究，在進行迴歸分析前，應檢視第三人效果變項間的相關係數及多元共線性。如果具有多元共線性，應避免把「認知差距」和「對自己的影響」同時輸入迴歸方程式。可行的作法之一，是把「對自己的影響」和「對別人的影響」作為預測變項，同時輸入迴歸方程式中（請參考Lo & Paddon, 1998）；另一種作法是採用一種「鑽石模式」（diamond model）的迴歸分析（Whitt, 1983; McLeod et. al., 1997），把「對自己的影響」與「對別人的影響」加起來變成一個新變項，並把這個新變項和「認知差距」一起輸入迴歸方程式，才能避免「多元共線性」的干擾。此外，未來的研究也應針對不同的題材，並選擇不同的受訪對象，就媒介「對自己的影響」、「認知差距」及「支持限制媒介」間的關係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參考書目

- 胡幼偉（民87）。《傳播訊息的第三人效果》。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 羅文輝（民87）。《台北市中學生收看有線電視色情節目之現況及相關影響研究》。台北：電視文化研究委員會。
- Cohen, J., Mutz, D. C., Price, V., & Gunther, A. (1988). Perceived impact of defamation: An experiment on third-person effec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2: 161-173.
- Davison, W. P. (1983).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 1-13.
- Davison, W. P. (1996). The third-person effect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8: 113-119.
- Duck, J. M., & Mullin, B. (1995). The perceived impact of the mass media: Reconsidering the third-person effe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5: 77-95.
- Glynn, C. & Ostman, R. (1988). Public opinion about public opin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65: 299-306.
- Gunther, A. (1991). What we think others think: Cause and consequence in the third-

- person effec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8: 355-372.
- Gunther, A. & Mundy, P. (1993). Biased optimism and the third-person effect. Journalism Quarterly, 70: 58-67.
- Gunther, A. (1995). Overrating the x-rating: 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censorship of pornograph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5: 27-38.
- Gunther, A. & Ang, P. H. (1996). Public perceptions of television influence and opinions about censorship i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8: 248-265.
- Gunther, A. & Hwa, A. (1996). Public perceptions of television influence and opinion about censorship in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8: 248-265.
- Gunther, A. & Mundy, P. (1993). Biased optimism and the third-person effect. Journalism Quarterly, 70: 58-67.
- Hamilton, L. C. (1992). Regression with graphics. Belmont, CA: Duxbury Press.
- Henriksen, L., & Flora, J. A. (1999).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nd children: Perceived impact of pro-and anti-smoking ad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6): 643-665.
- Hense, R., & Wright, C. (1992). The development of attitudes toward censorship questionnair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2: 1666-1675.
- Hoffner, C., Buchanan, M., Anderson, J. D., Hubbs, L. A., Kamigaki, S. K. Kowalczyk, Hoorens, V., & Ruiter, S. (1996). The optimal impact phenomenon: Beyond third-person effe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6: 599-610.
- L., Pastorek, A., Plotkin, R. S. & Silberg, K. J. (1999). Support for censorship of television violence: The role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and news exposur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6): 726-742.
- Hoorens, V., & Ruiter, S. (1996). The optimal impact phenomenon: Beyond the third-person effect.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6: 599-610.
- Howard, J. L., Reifler, C. B., & Liptzin, M. B. (1971). Effects of exposure to pornography. Technic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Obscenity and Pornography (Vol. 8, pp. 97-132). Washington, D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Hur, K. K. & Robison, J. P. (1978). The social impact of Roots. Journalism Quarterly,

55: 19-24.

- Kendrick, D. T., Stringfield, D. O., Wagenhals, W. L., Dahl, R. H., & Ransdell, H. J. (1980) Sex differences, androgyny, and approach responses to erotica: A new variation on the old volunteer proble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8: 517-524.
- Lee, C., & Yang, S. (1996, August).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censorship of sexually explicit visual content: A Korean ca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naheim, CA.
- Lo, V. H., & Paddon, A. R. (1998, August) The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nd support for restrictions of pornography: Some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Paper 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Baltimore, MD.
- Lo, V. H., & Paddon, A. R. (1999, August) How sexual strategies theory, gender, and the third-person effect explain attitudes about pornography. Paper 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New Orleans, LA.
- Lo, V. H., Neilan, E., Sun, M. P. & Chiang, S. I. (1999). Exposure of Taiwan Adolescents to Pornographic Media and Impact on Sexu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9(1): 50-71.
- McLeod, D. M., Eveland, W. P., & Nathanson, A. I. (1997). Support for censorship of violent and misogynic rap lyrics: An analysis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4: 153-174.
- Neter, J. Wasserman, W. & Kutner, M. H. (1983). Applied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Homewood, Illinois: Richard D. Irwin.
- Perloff, R. M. (1993). Third-person effect research, 1983-1992: A review and synthe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5: 167-184.
- Perloff, R. M. (1999). The third-person effect: A critical review and synthesis. Media Psychology, 1: 353-378.
- Rojas, H., Shah, D. V., & Faber, R. J. (1996). For the good of others: Censorship and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8:

163-186.

- Rucinski, D., & Salmon, C. T. (1990). The other as the vulnerable voter: A study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the 1988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 345-368.
- Salwen, M. B. (1997, August). Perceptions of media power and fairness in campaign '96: The third person effect and support for press restriction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hicago, IL.
- Salwen, M. B., & Driscoll, P. D. (1997). Consequences of third-person perception in support of press restrictions in the O.J. Simpson tri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7: 60-78.
- Salwen, M.B. & Dupagne, M. (1999). The third-person effect: Perceptions of the media's influence and immoral consequenc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 (5): 523-549.
- Surlin, Stuart U. (1978). Roots' research: A summary of finding.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2: 309-20.
- Svenson, O. (1981). Are we all less risky and more skillful than our fellow drivers? Acta Psychologica, 47: 143-148.
- Thiessen, D. (1994). Environmental tracking by females. Human Nature, 5: 167-202.
- Thompson, M. E., Chaffee, S. H., & Oshagan, H. H. (1990). Regulating pornography: A public dilemm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0: 73-83.
- Weinstein, N. D. (1989, Dec. 8). Optimistic biases about personal risks. Science, pp. 1232-1233.
- Wilson, W. C., & Abelson, H. I. (1973). Experience with and attitudes toward explicit sexual material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9(3): 19-39.
- Zillmann, D. & Bryant, J. (1982). Pornography, sexual callousness, and the trivialization of rap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2(4): 10-21.
- Zillmann, D. & Bryant, J. (1988). Effects of prolonged consumption of pornography on family values.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9: 518-544.
- Zillmann, D. & Bryant, J.(1989). Pornography: Research advances & policy consideration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Zillmann, D. & Weaver, J. B. (1989). Pornography and men's sexual callousness toward women. In D. Zillmann. & J. Bryant (Eds.). Pornography: Research advances & policy considerations (pp. 95-126)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Third-Person Effect, Negative Media Content, Social Distance and Support for Media Restriction

Ven-hwei Lo *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negative media content, social distance, third-person effect and support for restriction of media.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respondents tend to perceive greater negative effects of media content on others than on themselves. 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the magnitude of perceptual bias increased as the perceived negative effects of media content and the social distance of the comparison group increased.

More importantly,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growing literature on third-person effect by demonstrating that the magnitude of perceptual bias is not a reliable predictor of support for media restriction.

Keywords: Third-person effects, media restriction, media censorship, television violence, pornography

* Dr. Ven-hwei Lo i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n Taipei, Taiwan. This research was supported by a grant from the ROC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NSC 88-2412-H004-012).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Society, June 2000, Taipei, where it won outstanding research paper award.